



“它们都强调瘟疫之所以可怕，乃是它在客观上致人于死的同时，也引发由于惊慌而造成的自私、残酷等心灵上的瘟疫。心灵瘟疫扩大了病原体的杀戮潜力，而只有回归人性，回归专业，瘟疫始有可能得到控制。”

人类优秀文学中关于疫病的书写

■杜浩

新冠病毒的流行，使笔者想起了人类的灾难历史，想起了与灾难历史相关并努力为之书写的优秀文学作品……

一、加缪的《鼠疫》

关于人类遭遇“疫病”灾难的文学书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双重经典——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加缪的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7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畅销不衰。

在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中，加缪以象征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发生在阿尔及尔奥兰城的一场瘟疫。人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的折磨。

在《鼠疫》中，加缪不仅写了灾难，更写了灾难背后的人性，而且对人性挖掘的深度，令人警醒。加缪在描写瘟疫在激发人性的恶与贪欲的同时，更看到了复苏的是善、是同情、是良知，是爱这些人类的精神力量和品质。正是这种蕴含在每个普通人体内的勇气和正义，在生命面前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带来奥兰城的最后胜利。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强调的，“要有直面荒诞的勇气，又要有平衡矛盾之毅力；要有反抗超越之举，又要有将爱内化为主体精神之境界，从而达到主体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和谐。”

二、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失明症漫记》是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这部小说被认为是自《鼠疫》之后疾病灾变题材的另一次“文学探险”，并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颁奖词称赞这部作品“用想像力、同情心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让我们把握到捉摸不定的现实。”

小说中描写到，西方某个大城市突然爆发传染病，人们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白色眼疾”，随之成了失明者。这种疾病迅速蔓延开来，城市里一片混乱。于是，当局下令将失明者关进精神病院，派士兵把守，并且枪杀失明者。此时此刻，罪恶的念头在幸存的失明者中萌芽。小说中的医生太太，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声称自己也是瞎子，因而发生的一切都落入她的眼中：机智的少妇、懦弱的丈夫、刚烈的妓女、狠毒的恶棍，演出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喜剧……

若泽·萨拉马戈通过此书想告诉读者的是，我们都是如此盲目，那么，如果失明症像瘟疫一样蔓延而只有一人得以幸免，人类社会会怎样？这本书中，作者用“失明”作为一种肆虐的传染病，描绘了人在面对足以颠覆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灾害时所表现出的人性特质，对人性中的善与恶，尤其是疾病灾难中人类的欲望和脆弱，进行了异常深刻

的揭示。

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5年。

这本书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这长达60年时间的爱情纠葛描写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读者展示了人类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

小说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丰富复杂繁复的爱情表达方式的描写中，将战争、瘟疫和其他灾祸巧妙穿插，再现了加勒比地区的世事沧桑，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但在灾难面前，人的心灵格外需要亮光、温暖和对生命的激情。这个时候，爱情就显得尤为可贵。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霍乱中的这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极致的爱情故事，给我们的思考就是，苦难最终的救赎，必然是爱……

四、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

法国作家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是写于1951年的英雄浪漫主义小说。小说描写一位意大利轻骑兵上校来到法国南部，正赶上一场蔓延的霍乱，也邂逅了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少妇，两人开始了千里同行的旅途。途中他们到处碰到官兵对感染者的追杀。两人在患难中渐生微妙的情愫，而少妇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瘟疫的阴影……

《屋顶上的轻骑兵》与加缪的《鼠疫》的主题一致，探讨瘟疫本身和人在瘟疫中的行为，“它们都强调瘟疫之所以可怕，乃是它在客观上致人于死的同时，也引发由于惊慌而造成的自私、残酷等心灵上的瘟疫。心灵瘟疫扩大了病原体的杀戮潜力，而只有回归人性，回归专业，瘟疫始有可能得到控制。”

加缪曾说：“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这些记录人类“疫情”“疫病”灾难的文学图书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它们把我们人类的痛苦、悲哀、噩运、灾难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进行解读和认识。人类与疾病、灾难中的人性表现、人在灾难中的道德和伦理的表现，这些认知经验因超越了具体的事例而具有了普遍的精神特质……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莎士比亚

编者按：

自有人类记载的历史以来，人类记忆中关于各种各样的灾难的记录，难以计数。这些灾难记忆，其中有的是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痛苦、不幸，有的是疫情、疫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面对不可抗拒的各种灾难，人类往往通过文化的视角，用文化艺术的样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认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人众志成城抗击疫病，它又会带给人们怎样的思考和记忆？



没有微生物，我们将无法消化、无法呼吸；没有我们，绝大多数微生物依然无恙。

理解疾病，居安思危

——读《逼近的瘟疫》

■赵青新

2020年的春天竟然会是这样的境况，疾病来势汹汹，给所有人都上了一堂严峻的课。阅读是亡羊补牢的举措。美国记者、科普作家劳里·加勒特长期关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先后摘取皮博迪奖、乔治·伯克奖和普利策奖三大新闻奖。《逼近的瘟疫》是她的代表作。

该书梳理了近些年来流行疾病发生的历史，考察的具体事例包括玻利维亚出血热、马尔堡病毒、黄热病、巴西脑膜炎、拉沙热、埃博拉、猪流感、军团热、艾滋病。瘟疫来袭，人类措手不及，健康遭受严重威胁，恐慌情绪也在蔓延。

病因并非毫无根据，常与某种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破坏密切相关。比如，马丘比病毒。20世纪中叶，玻利维亚掀起了一场砍伐森

林、开垦农田的运动，打乱了卡洛斯野鼠的天然习性，这种啮齿动物迁居到城镇居民家庭，带来了人类无法抵抗的病毒，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行病。类似的情形也是其他疾病爆发的原因。

自古以来，人类就遭受瘟疫的威胁，生命随时处在死神镰刀收割的阴影里。直到18、19世纪近代医学兴起，20世纪医学更是突飞猛进，除了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少数例外，似乎不再有疾病能够大规模地威胁人类的安全。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人类历史上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本书在微生物的层面上探讨了进化生物学，仔细观察了病源和传染病媒介如何变化，来对付人类自己保护的防御武器。微生物的生

存是一部传奇史诗，充满着无尽的冲突与合作。没有微生物，我们将无法消化、无法呼吸。没有我们，绝大多数微生物依然无恙。人类不可妄自尊大，随意破坏微生物群落的均衡生态。病毒寄生宿主，不断变异，城市的拥挤密闭给微生物提供了农村没有的大好机会。回顾往昔，有多少疾病是因为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或者贪吃野味而引起的呢？

同时，本书还考察了人类如何通过计划不周的发展项目，指导不当的医疗措施、方向错误的公共卫生政策、目光短浅的政治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在疫情期间的糟糕处理，欠下了一张张巨额的医疗“账单”。这些疾病有很多发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地区，贫穷和落后是一层原因，新殖民主义对当地经济的剥削和造成的生态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

疾病是天灾，也是人祸。最典型的，莫过于艾滋病。这个病最早在美国男同性恋人群中被发现，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性解放、性泛滥的一个后果。然后，社会边缘的“瘾君子”们被发现是另外一个大的受众群。因此，艾滋病人在起初被认为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的，他们也常常自暴自弃。可是，更多的艾滋病病人出现了，有一些无辜的女性因为丈夫、情人而染疾，还有婴幼儿因母胎感染，海地、非洲等地的穷人因为卖淫或卖血等行为感染了艾滋病。这些问题牵涉性文化、种族主义、贫富差距、女性主义等，围绕它的争议引发价值观的动摇。

作者告诫我们，必须重建关于疾病的新思维方式，接受人类也是食物链一环的局限，学会与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在一个理性的地球村里。



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转瞬即逝的时代潮流所支配。

动物是人类的伙伴

——读《亲密关系》

■林颐

《亲密关系》是一部讲述人与动物关系的历史著作，作者布莱恩·费根是剑桥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士。作品梳理了狗、山羊、绵羊、猪、牛、驴、马和骆驼这八种动物被驯化的过程，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人类的历史。这些动物与人类建立联系的时间有先后，影响人类历史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的是，它们与人类之间都存在着亲密的伙伴关系。

根据古代动物骨骼专家帕特·希普曼“狼—狗”推论以及遗传学家对早期犬类的研究，从冰河时代后期开始，狼的驯化经历了很长的过渡期。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对肉食共同需求的基础上，狼逐渐成为人类的紧密合作伙伴。

作者运用分布各地的岩洞壁画和大量墓穴犬类遗骨，还原了狗成为人类伴侣和狩猎伙伴的过程。这个过程部分涉及饮食的改变，也体现了狩猎生活向农耕定居

生活的转变。我们与狗紧密生活在一起已有大约15000年。其间，家畜在人类生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猎人成为了农民，作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动物管理的需要导致的结果。

八种动物的故事和历史学阐释，建立在丰富翔实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因为这些动物各有特质，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山羊和绵羊的驯化，让继承权、放牧权和所有权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讨论家猪时，作者结合了新几内亚人的“凯嗣”仪式，这种宰杀和飨宴活动的目的是取悦祖先，并且人为控制生猪的数量；从春秋战国到秦皇汉武，从成吉思汗到满清入关，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马背上的历史。

回溯往昔，我们会发现，动物在人类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文化史、艺术史等方面，在所有的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们是人类历史的共同创造者。人兽关系上的尊重，是必要的条件，骑士必须与他的战马合为一

体，有经验的游牧民会从骆驼的鼻子里感知前方的土壤和气候。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动物对于人类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冷酷无情，唯利是图，麻木不仁，人类对于牲畜和动物的态度趋向于野蛮和残忍。

该书的后面两章讲述19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动物保护运动和动物的现当代生存状况。作者呼吁同情心的回归，痛批“选择性仁慈”，人类对动物的喜爱，不能仅仅局限于宠物或对异国野生动物的迷恋，我们还要关注家禽役畜所遭受的苦难。作者说，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转瞬即逝的时代潮流所支配。那么，作为当代人，我们应该怎样重建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呢？

作者主要援引了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在其代表作《动物解放》里的经典论述。辛格认为，人对动物的态度形成于幼年时期，在儿童教育领域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怎

么看待我们所吃的动物？最难克服的一个或许是“人类优先”的臆断。辛格说，必须认真对待动物遭受的痛苦，起码应当得到我们相同的关系，假如这种痛苦并非必要，就要存心去解决。人类对其他非人类动物的压迫是物种歧视，漠视动物的人往往也会漠视人类族群里那些不幸的个体（比如残疾人），动物解放运动比其他解放运动都要求人类具有更大的利他主义精神，因为动物自己没有能力要求自身的解放，人类却有能力继续压迫其他动物以至永远，直到把我们这个星球搞得生灵涂炭以生存。

在2020年的春天，在瘟疫围城的时刻，我们需要默默地阅读，默默地思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怎样消失在不断加剧的裂痕之中的？其他生物，包括病毒，它们是否在将来仍会发动自我防御和进攻的战斗？而人类，是否仍会将自己抛向四面楚歌的困境？这些问题，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回答方式。



多少年过去了，尊重和敬畏生命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生命礼赞

——读《海狼》

■陈慈林

农历己亥与庚子年之交，华夏大地罹遭新冠病毒疫情，微信朋友圈时而有朋友和熟人染病甚至丧生的消息传来，只叹音容笑貌犹在眼前，阴阳两隔竟成故人。又见无数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奔赴疫情严重地区救援，他们大仁大爱，奋不顾身从病毒肆虐中救回了成千上万病人，无数次令人泪目。在这样的氛围中重读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海狼》，使我进一步增加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我第一次读《海狼》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彼时我尚青春年少，面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产生了一些悲观厌世情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是否应该得到尊重？虚无迷惘一度充塞了我的心头。

《海狼》以发生在一艘海豹捕猎船“魔鬼号”上的故事为主线，塑造了船长“海狼”拉森和偶然流落到船上的作家卫登两个鲜明的艺术形象不同的生命观和处事原则，使我接受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启蒙教育。

“魔鬼号”上没有法律秩序，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没有人性，更没有人类最真最美的情感。船长“海狼”拉森出身贫寒，小时候备受压迫，因而极度仇恨压迫者与不劳而获者，并仇视主流社会。但是，他一旦占据了某种统治地位，哪怕只是一艘海盗船的船长，却又变本加厉地去压迫别人，践踏弱者。他秉持“生命像是酵母……大吞小才可能维持他们的活动，强食弱才能保持他们力量”的理念，使“魔鬼号”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盘踞的巢穴。

文学批评家卫登出海遇险，被“海狼”拉森救起，并在“魔鬼号”上被强迫做苦力。拉森蛮横无理，视船员生命为草芥，轻蔑地称生命为“酵母”。他的残暴激起反抗，船员把他和同伙大副扔入大海。但超人式的拉森卷土重来，他残忍了带头人反抗的两名水手，并胁迫卫登担任了“魔鬼号”大副。

年轻美貌的女作家莫德此时也因风暴遇险，被救上了“魔鬼号”。她与卫登一见如故，引为同类。不久拉森在欲强暴莫德时头痛病发作，卫登带着莫德逃到努力岛，结为夫妻。

拉森却因众叛亲离，旧疾复发后失明，孤身随破损的“魔鬼号”漂流到努力岛。曾经凶残无比的拉森，最后在岛上孤寂地丧生。卫登和莫德修复了“魔鬼号”，为拉森举行海葬后，双双安全回到大陆。

拉森和卫登不同的生命观，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拉森迷信暴力取胜，反对仁慈宽容，颇具暴力崇拜，这与如今肆虐生命的新冠病毒何其相似！

卫登虽然是个文弱书生，但他始终保持道德和良知，他在“海狼”面前谨小慎微，忍气吞声，但从未放弃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关键时刻他的正义感、勇气和智慧爆发，拯救了自己和他人。他是生活和道义的真正强者，如今与新冠疫情抗争的人们身上，也体现了这种品格。

40多年过去了，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也从而立之年步入古稀，但“海狼”拉森式的人物尚未绝迹，如何崇尚、敬畏自然？如何尊重和敬畏生命仍然是摆在我和读者朋友面前的课题。因此，杰克·伦敦的《海狼》仍是一部激情四溢、充满生命力的作品。